

国家民委重点文化项目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论



李晋有等 主编

巴蜀书社

444542

国家民委重点文化项目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论

费孝通

主编
李晋有 等

巴蜀书社

责任编辑：陈大利 侯跃生 李 蓓
封面设计：张仁华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论② 李晋有等 主编
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 编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福利东方彩印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375 插页 1 字数 270 千
1998 年 3 月第一版 1998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 册

ISBN7—80523—846—4/K·182

定价：平装 29.00 元

封面题字：费孝通

责任编辑：陈大利

侯跃生

李 蓓

目
录

- 民族古籍与语言学 …… 戴庆厦 (1)
- 满文档案与民族史研究 … 王钟翰 (17)
- 文津阁碑文浅释 …… 孙继为 (20)
- 从清帝东巡谒陵看其敬天法祖思想
…………… 唐英凯 (27)
- 满文及其文献在河北的发掘与使用
…………… 王庆丰 (40)
- 长白山与满族的祖先崇拜
…………… 刘厚生 (47)
- 清皇太极改革诸申辨正 … 赵展 (56)
- 吉林他塔拉氏家谱研究 … 滕绍箴 (65)
- 檀君朝鲜年代考 …… 吴花顺 (78)
-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略考
…………… 车今顺 (87)
- 保安族聚居区的古今口碑和考古
发现述略 …… 马克勋 (100)
- 乾隆四十六年反清起义中的东乡族
…………… 马志勇 (112)
- 史诗《江格尔》形成年代考
…………… 巴伊 (122)
- 裕固族古代文献及其研究
…………… 钟进文 (128)

穆罕默德·沙迪克·喀什噶里及其学术作品

艾尔肯·伊明尼牙孜·库吐鲁克 著 木合塔尔 译

- (139)
- 西夏文《纂要》释补 史金波 聂鸿音 (144)
- 云南民族迁徙史诗述论 苍 铭 (151)
- 试论中国鼓楼文化的存在与价值 陈乐基 (170)
- 论羌族神话与审美观念 李 明 (180)
- 贵州仡佬族宗教信仰初探 李艳丽 (190)
- 哈尼族的古代婚俗 傅永寿 (200)
- 略论白族的密教神话 奚兴灿 (209)
- 论彝族“节威”的产生、发展和演变 ... 依 热 (221)
- 贵州彝文献与彝文书法 李平凡 (232)
- 明代彝族土目安国泰《夷书九则》研究
..... 黄建明 陈华琴 (239)
- 苗族古歌中关于采冶金属的记述 李炳泽 (249)
- 土家族古籍及其价值 田仁利 (257)
- 《达加》与《灰姑娘》之比较 陆丽明 (269)
- 东巴经典所载神话中的神海研究 白庚胜 (281)
- 论《苗疆闻见录》的民族史民族学价值
..... 吴一文 (296)
- 漫话湘西苗族“丧葬”习俗 张应和 (306)
- 雪域名刹拉卜楞寺及其寺志汉译本简述
..... 马更志 道 周 (315)

一、民族古籍与语言学的密切关系

民族古籍是指用民族文字记载的古书，除此外还包括用汉文记载的与少数民族有关的古书，口耳相传留下的古代民族文化，即所谓的“口碑文献”。主要有以下内容：1. 用民族文字记载的古籍文献，包括用古文字、不通用文字记载的古代文献。我国历史上曾使用过一些古文字，后来不使用了，成为死文字，如突厥文、回鹘文、察合台文、于阗文、焉耆——龟兹文、粟特文、八思巴字、契丹大字、契丹小字、西夏文、女真文、满文、东巴图化文字、东巴象形文字、哥巴文、老彝文等。留下大量宝贵的历史文献。2. 用汉字或其他文字记载的、与少数民族有关的历史文献，包括历史、文化、哲学、宗教等。还包括用汉字或其他文字记录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历史资料。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不仅记录下汉语的文献，还记录了许多非汉语的语言。如《越人歌》（前528年）、《维甲令》（前484年）、《白狼王歌》（74年）。至于用汉字系统记录的非汉语文献，那就更多了。如西夏文、契丹文、水书、方块壮字、方块白文、方块哈尼字等。3. 用少数民族语言留传下来的、反映少数民族古代社

会、历史、文学、宗教等特点的传说、史诗等。这一领域的口碑文献是大量的，几乎每个民族都有。如许多民族都有《创世纪》、《迁徙记》等历史史诗，还有反映古代英雄人物的英雄史诗等。以上所述的几项内容，每一项都是用语言文字记录的，都与语言文字有关。一般说来，古籍文献包括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内容是民族文化遗产，有精华、有糟粕，而形式是语言文字，包括民族文字和汉字等。研究民族古籍，既要研究其内容，又要研究其形式，因为只有通过形式才能更好地认识其内容。这就是民族古籍与语言学存在密切关系的基本道理。

古籍文献的整理、研究要达到科学性、创新性的水平，必须要有语言学的理论、方法。有作为的文献学专家，往往也是语言学家。而且有不少文献学家开始是做语言学研究，后转入文献学研究。语言学家因为熟悉语言，做文献学的整理研究有其天然优越条件。举例来说，北京大学季羨林教授既是一位著名的文献学家，又是一位语言学家。20世纪初，在新疆发现了吐火罗语的残卷，确定为原始印欧语的一种独立语言。后又称焉耆——龟兹语，是因为经残卷考释，认定这个语言分两个方言，一个在吐鲁番——焉耆一带，称之为焉耆语，一个在库车一带，称之为龟兹语。季羨林先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从德国著名语言学家E·西克研究吐火罗语，1980年后，运用语文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知识开始研究和译释新疆博物馆珍藏的吐火罗语A《弥勒会见记剧本》残卷，发表了《吐火罗文A中的三十二相》等论文，对吐火罗语的研究有了重大突破。吐火罗语的发现有重要语言学价值，如在印欧语的分类中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在地理位置上本属于东方的S(satəm)类语言，在事实上则属于西方的K(kentum)类语言。马学良教授原来也是学语言学的，最早研究了撒尼彝语，著有《撒尼彝语研究》(1951年出版)。40年代，他在云南省武定、禄劝一带研究彝族语文时体会到不了解彝族的社会

历史、神话传说、彝文经典，就无法深入研究语言，于是就做彝文古籍的整理、研究工作，先后翻译了《傣文作斋经译注》、《傣文作斋献药供牲经译注》等，成为一位著名的彝文文献学专家。李方桂、柯蔚南（W·south coblin）合著的《古代西藏碑文研究》一书，是国际上研究吐蕃碑铭的最新成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两位作者是著名的汉藏比较语言学家，有深厚的语文学功底，能用语文学知识及汉藏对比知识正确释义，解决许多过去的没有认识透的问题。

民族古籍与语言学的关系，存在两个方面：一是利用民族古籍的材料和成果研究语言学，即从民族古籍中研究语言、文字获取丰富的语言学材料、观点。二是使用语言学方法整理、研究民族古籍，使文献古籍的整理研究更具有科学性。这两个不同的方面，各有自己的任务，又各有自己的方法，但二者是有密切联系的。如果你只想成为一个文献学家，那就侧重在第二方面的知识和修养上；而如果你既想当文献学家，又想当语言学家，那就需要两方面的知识和修养。下面从这两个方面谈谈民族古籍与语言学的关系。

二、利用民族古籍研究语言学

语言学有共时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之分。民族古籍对语言学研究的价值主要在历史语言学上。因为民族古籍所反映的语言是古代的语言，人们有可能从中了解到古代语言的特点。由于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有助于共时语言学的研究，因而古籍文献的研究对共时语言学的研究也是有价值的。民族古籍对历史语言学的价值主要是：辨认尚未被人们认识的古代语言，认识古代语言的特点及其演变规律，认识古人是怎样认识语言、研究语言的。从与语言学的关系上看，古籍文献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属于语言文

字研究的文献。如藏族的《三十颂》、《性入法》，相传为藏文创制者图弥三善札所著，是藏族传统的语法书，是藏文文法的经典著作。此文献对后代研究藏语语法及认识藏族如何分析本族语言的语法都有重大价值。西夏文献《文海》的刊布，加快了解读的步伐，因为这是西夏文的一部韵书，为确定西夏文的字形、字义和字音提供了科学依据。西夏文的解读，还为汉藏语音韵的历史比较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材料。另一类是非语言文字研究的文献。人们可以从文献语言材料上认识当时的语言特点。二者相比，后者是大量的。

(一) 辨认未知语言

在人类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有的语言由于各种原因在历史的某个阶段消失了，成为死语言。语言学的任务之一是发掘死语言，认识历史。在亚洲这块土地上，历史上民族迁徙、民族融合等现象不断出现，致使有的语言分化了，有些语言消失了。如佉卢文所记录的语言（属印度语支中的西北俗语）就是一种已消失的语言。佉卢文是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后4、5世纪使用的一种古文字，使用于古代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苏联等地以及我国的新疆一带，大约用了七百多年。这种文字，是18世纪时考古学家在印度河流域发现的，后对它作了解读。已消亡的语言还有吐火罗语，西夏语等。我国发掘出的古文献中，有的是否反映它是已消亡的语言，学术界认识不一致，有待今后继续探讨。如南语（Nam）有文献记载，但是否是一个独立的语言尚未被确认。它的文献材料是20世纪初发现的。文献全文共398行，是用藏文书写的。这个卷子原在甘肃千佛洞，现存伦敦联邦关系部图书馆。对这个语言进行较多研究的是英国托马斯（F·w Thomas）教授，他在1939年把这个语言定为南语，假定南语是古羌人的一支。我国闻宥教授1981年在《民族语文》上发表了

《论所谓南语》一文，怀疑有无南语的存在。还有一个是象雄语(zhang zhung)。这个语言的文献是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发现的。1926—1933年，托马斯在敦煌写卷中发现的是用藏文字母写的两篇医药文献。1936年又在巴黎图书馆发现了一篇文献，约290行。他经研究认为这是用象雄语写的，并认定它是一种属于藏缅语的已消亡的语言。但至今它是否是一种独立的语言仍是个谜。

对古语言的辨认主要使用词源考释法。所谓词源考释法，是通过未知语言和已知语言的比较，认识未知语言。这当中，主要是寻找同源词，并根据同源词求出语音对应。因为确定一种语言的性质，主要看词源。词源关系变化较慢，词源的异同能较明显地反映语言的亲属关系。除了词源考释法外，还要采用综合比较法，即比较语音、语法特征，社会文化特征等。

下面以《白狼王歌》为例具体说明释读古语言的基本方法。

《白狼王歌》是《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中记载的一首使用藏缅语族一种语言写作的诗歌。据历史记载，后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年)，白狼王为了歌颂当时中央政权的统一领导，写下了这首表达他们心向汉朝的诗歌。这首歌由一个叫田恭的官员翻译，并由从事史李陵与田恭护送到都城洛阳。这首歌的语言学价值在于，它是最早记录藏缅语的注音资料，虽然只有44句，176个字，但却是研究藏缅语族语言十分有价值的材料。所以从明清以来，不少学者对它进行了考证。在我国，有王静如、闻宥、丁文江、马长寿、方国祥、陈宗祥、邓文峰等，国外有美国的柯蔚南(W·south Coblin)。从语言学上，对这首诗可做如下子课题的研究。

1. 因为是两种语言对照，究竟是先有汉文诗然后再译成白狼语，还是先有白狼语诗然后再译为汉语？

我认为，《后汉书》中记载的那种先有白狼语诗然后再由官

员田恭译为汉语的说法不足为信，应该是先用汉文写成的，然后再在句子下面用汉字译注白狼语，其注法大多以词为单位直译，不是整句翻译的。为什么？

其一，从语序上考察，汉语诗部分，句子通顺，符合古代汉语诗词的造句规则，而白狼语诗部分，语序不是藏缅语的，而是按汉语的语序以词为单位对译的。如汉语诗的支配结构词组，是“动词+宾语”，白狼语也按此顺序对译，显然不符合藏缅语“宾语+动词”的语序。例如：第七句的“多赐缙布”，白狼语是“邪毗缙铺”，“邪”注“多”，“毗”注“赐”，“缙铺”注“缙布”，动词在宾语前。其他又如：

第三十一句：食肉衣皮

阻苏邪犁

（“阻”注“食”，“苏”注“肉”，“邪”注“衣”，“犁”注“皮”，其顺序也是动词在宾语前。）

第三十二句：不见盐谷

莫殒粗沐

（“莫”注“不”，“殒”注“见”，“粗”注“盐”，“沐”注“谷”，也是动词在宾语前。）

其二，汉语诗中出现一次以上的字，在白狼语诗的句子大多数是用相同的字与之相对，这从上下句的比较中可以证明白狼语是后来以词对译的。例如：

第十六句：日入之部

且交陵悟

第十八句：归日出主

路且拣雒

第二句：与天意合

魏昌踰糟

第二十句：与人富厚

魏菌渡先

第七句：多赐缙布

邪毗缙铺

第四十一句：父子同赐

捕茆菌毗

第十九句：圣德深恩

第二十七句：去俗归德

其三，从用词上考察，诗中用了许多汉语借词，如“译、圣、德、危、险、万、荒、服、之、传、汉、怀、匹、臣、仆”等，其中多数是汉族封建社会官场文章中常用的词，而这些借词用在白狼语诗里则比较生硬。白狼语句里，有的是用同音字（或近音字）借用汉语词的，如柳（里）孽摸（慈母）、缙（布）等。可以设想，如果这首诗是先对白狼语写的，作者在用词时就有可能用适合白狼语特点的词，避开一些难以使用的词。

根据以上几点考察，可以认为《白狼王歌》是先有汉语诗，然后才用白狼语以词为单位注义的。如果这个论点可以成立，那就可以认为《白狼王歌》的价值主要在于语音、词汇的研究，而语法的研究的价值不大。

2. 白狼语的语音特点究竟是什么？

要从这不足四百字的歌里构拟白狼语的语音系统是不可能的，但还是可以了解到白狼语当时的一些语音特点。主要使用的办法是通过白狼语和汉语的同源词语音比较，参照古汉语语音构拟，推测白狼语语音的一些特点。如“家”一词，白狼语注音为“滂”，“滂”的上古音读为 $rjəm$ 平，中古音读为 $jiəm$ 平，藏缅语有些语言也读为 $-m$ 尾，如藏文 $khyim$ ，缅文 im ，载瓦语是 $ju m^{51}$ 。这说明白狼语当时有 $-m$ 尾。

又如：“深”一词，白狼语注音为“诺”，“诺”的上古音为 nak 入，中古音为 $nāk$ 入，藏缅语有些语言也读为 $-k$ 尾，如缅文是 nak ，载瓦语是 nik^{21} 。这说明白狼语当时有 $-k$ 尾。

又如，从对音中可以推测白狼语的声母大约有过清浊对立。因为在同源词的语音对应中，我们看到白狼语注音中用古汉语浊声母的字，在藏缅语族声母分清浊的语言里，多是浊声母对浊声母，清声母对清声母。如果当时的白狼语不存在清浊对立，在使用汉字注音时就不可能是清浊界线大体分明。如“赐”一词，白

狼语注为“毗”，上古音是 bjid 平，中古音是 bji，藏缅语许多语言是浊音，如彝语是 bl³¹，哈尼语是 b₁³¹。

3. 通过同源比较，证明白狼语中有些基本词与藏缅语有同源关系，以此可以证明它们之间的同源关系。例如：

汉 义 肉 食 飞 石 木

白狼语记音 苏 阻 使 禄 息

上古音 swag 平 tsrjag 上 bjín 去 luk 入 sjæk 入

中古音 suo 平 tsjwo 上 bjiäa 去 luk 入 sjæk 入

藏 文 ɕa za hpur rdo ɕiŋ -

缅 文 sa tsa pyam klök sats

载瓦语 jo²¹ tso²¹ tar²¹ lu²¹ sik⁵⁵

本语 同源的，多是词汇中最基本的词，包括自然现象（天、雨、石、木）、食物（盐、肉）、动作行为（来、见、赐、飞、出、食）、性质状态（甜、长、深）、人物（人、父）等。

4. 判定白狼语的系属。

以往学者对白狼语的系属归类，有多种说法，有彝语说、纳西语说、嘉戎语法、藏语说、普米语说、西夏语说等。我认为与缅彝语接近，特别是与缅语支接近。主要是在语音上，白狼语有辅音韵尾，韵尾又分鼻音尾和塞音尾两套，这一点同缅语支，而不同于彝语支。在声母上，白狼语没有鼻冠音复辅音声母，也没有带前缀辅音的声母，是单辅音声母的语言，这个特点也接近缅语支。

（二）认识古代语言的特点及其演变

通过文献的分析及与亲属语言或现代语言的比较，确定其特点及演变规律。“墨吉戛斯”是我国汉文史籍中对唐代柯尔克孜族的称呼。墨吉戛斯人七至九世纪居住在叶尼塞河上游一带，有自己的语言文字。胡振华根据墨吉戛斯人的 70 多块碑文，分析

了其语言的特点，包括音位系统、语法、词汇的一些主要特点。史金波的《〈类林〉西夏文译本和西夏语研究》一文，以西夏文《类林》中的语料对西夏语语音、词义、构词法和句法中的一些问题作了考证，解决了过去研究中的一些难点和失误。王弘力的《契丹小字墓志研究》一文，研究契丹小字墓志中的部账、姓氏等问题，以及契丹语与蒙古语的语音对应、突厥语借词等问题。有些学者研究女书（湖南省江永县上江圩乡一带妇女流行的书写符号），发现女书语法中有百越语底层。

藏文、缅文等古代拼音文字，对于语言史的研究具有特殊的价值。通过它记载的古籍文献的研究，能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些语言的古代特点，为研究语言的历史演变提供可靠的依据。有的专家把它比喻为“拼音的切韵”。藏文拼写的是7世纪前后的藏语，比较准确地记录了当时藏语的语音特点，从藏文上可以看出古时藏语的声母和韵母都是比较复杂的，拿藏文与现代藏语方言进行比较，就能看出古今藏语的演变。

黄布凡在《十二、十三世纪藏语（卫藏）声母探讨》一文中根据有关藏文拼读法和正字法的三篇藏文文献材料，并参考现代方言读音，对12、13世纪藏语的声母进行了探讨。认为12、13世纪卫藏地区的藏语声母已大大简化，前置辅音有些已脱落，有的已合并，部分基辅音和后置辅音结合变为新的复辅音。车谦的《吐蕃时期藏语声母的几个问题》一文，根据吐蕃时期的文献，研究了这一时期藏语声母的几个特点。认为“大约到了8、9世纪时，复辅音声母已经开始了一些变化，前置辅音、上置辅音出现了交替现象，有些已经脱落，部分下置辅音也有脱落的迹象。

鼻语文献语言为单音节，现代口语为双音节，显示了鼻语词汇双音节化的进程。例如：

文献语言

ne³³

现代口语

ne³³si³¹ 眼睛

o ⁵⁵	o ⁵⁵ qo ²¹ 头
ɬa ³³	ɬa ³³ ba ³³ 月亮
no ⁵⁵	a ⁵⁵ no ⁵⁵ 猴

对古籍中的通假字和异义能够得到古音的知识。青年学者李玉以通假字、异义为依据，研究了建国后战国秦汉墓葬出土的一批简牍帛书，探讨了上古音的音韵，出版了《秦汉简牍帛书音韵研究》一书，勾画了秦汉时期汉语音韵系统的大致轮廓。作者共收集 6800 多对通假字，运用以概率统计为主的统计法，结合历史比较法、内部构拟法和类型学拟测法对秦汉时期的语音系统进行系统研究。

除语音外，还能从文献中了解词汇、语法以及其它方面的语言特点。如季羨林先生通过《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本与其他语言异本的比较，研究了吐火罗语的语义问题，1943 年写出了《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一文。陈宗振的《突厥语词典》中保留在西部裕固语的一些古词语一文，从八世纪《突厥语词典》中找到一些至今仍保留在西部裕固语中，而这些词在现代维语中已消失或变化很大。聂鸿音的《试析西夏语表“五色”的词》一文，根据西夏文献和亲属语言比较，把西夏语中与五色（青黄赤白黑）有关的分类，分出哪些是固有的，哪些是新造的，哪些是借用的。这样分析，有助于对西夏语词汇系统的认识。1934 年，罗福成在《辽陵石刻集录》第四册中解读了契丹小字辽陵帝后哀册中若干帝号、年号、干支和年月日期用字，1987 年，黄振华在《契丹文年月日数字名称考》一文中对契丹文年月日期及数字名称的音值做了探讨。13 世纪的《元朝秘史》，不仅是研究蒙古族历史、文字的珍贵著作，而且也是研究中世纪蒙古语的重要文献。确精扎布的《〈元朝秘史〉语言的数范畴》一文，通过电脑，对《元朝秘史》中的数范畴做了研究，取得了新的成果。

从文献中还能了解到当时的文学语言特点。如分析彝族文献《指路经》，可以看到如下特点：当时的文学语言大都为五言诗体，用韵形式多样，句韵有首韵、腰韵、尾韵，章韵有换韵、交韵、松紧韵、顶韵。叙法除顺叙外，还有逆叙、夹叙。

古籍文献的修辞往往存在一些不同于现代语言的特点，对其研究有助于了解当时的语言运用特点。唐建华的《〈作祭献药供牲经〉修辞艺术初探》一文对马学良先生40年代记录的彝族宗教典籍《作祭献药供牲经》一书进行了修辞艺术分析。文中指出，该文献灵活运用了赋、比、兴的修辞手段，突出摹状的形式及特点，巧妙应用连续反复和间隔反复以及多种形式的排比等，反映了彝文献古籍的修辞特点。

（三）使用语言学方法整理研究古籍

民族古籍的整理、研究涉及到历史学、民族学、文化学、宗教学、语言学、文字学等诸方面问题，这里着重谈谈与语言学有关的几个问题。

1. 关于使用记音符号问题

古籍整理、研究涉及用什么记音符号的问题。特别是整理口碑文献，怎样记音是一个关键。记音是否准确，关系到整个材料的价值。我国民族古籍的记音大多使用两个办法：一是用汉字记，二是用国际音标记。笔者主张用国际音标记。因为用国际音标记得准确，国内外都能使用，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融水苗族埋岩古规》，被认为是一部“习惯法”。1986年融水县成立古籍整理小组，进行了搜集整理，采访了60多位著名歌手。开始时是用汉语谐音记录，用音乐简谱记音调，但自1990年起，改用国际音标记音，增加了这部资料的科学性。

2. 关于翻译、注释问题

由于我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汉语文是各民